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母国因素实证分析

姚利民 王爱丽

摘要: 中国强国梦需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但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受到母国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综述跨国公司成长驱动因素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等3个层次分析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国际化与创新双轮驱动,并利用1996~2011年7个主要国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发展水平指数,对世界500强企业成长的母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需要母国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基础、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升级、高R&D强度的创新基础。政府支持和外汇资源利用对于中国启动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 母国因素; 国际化驱动; 创新驱动; 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 F2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16) 01-0086-10

一、引言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影响全球产业的资本流向与产业链布局,决定着世界贸易的利益分配。经过30多年的开放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但是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发展世界水平的中国跨国公司刻不容缓。^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但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还不多,中国强国梦需要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跨国公司。^②什么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胡鞍钢认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进入世界500强的“门槛”、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③王志乐(2008)认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要具备全球战略、全球管理、全球责任,从而成为全球公司。赵斌(2012)发现,世界一流企业不仅要实现优秀的经营效益,而且要积极打造和发挥卓越的核心能力并且履行社会责任。胡鞍钢等(2013)认为,世界一流企业具有超长跨国经营历史、超大经营规模、极强盈利能力、高度市场占有率,不仅是世界行业发展的引领者、核心技术的创新者、知名品牌的拥有者,还

作者简介: 姚利民,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FDI与跨国公司;王爱丽,浙江工业大学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项目编号:13&ZD04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产业国际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边际效应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1YJA790185)。

① 隆国强. 发展世界水平的中国跨国公司刻不容缓 [EB/OL]. 中国经济新闻网. <http://www.cet.com.cn/ycpd/xbtj/915810.shtml>. [2013-07-22]。

② 王健林. 经济强国必须要有一流跨国企业 [EB/OL]. 人民政协网. <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820/c34948-22620466.html> [2013-08-20]。

③ 胡鞍钢. 成为世界级企业需要满足三个标准 [EB/OL]. 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427/152315303717.shtml>. [2013-04-27]。

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垄断者。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巨大的规模实力、优良的经营效益、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世界性的品牌影响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那么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呢？这不仅由企业自身微观因素所驱动（王志乐，2008；胡鞍钢，2013），同时受到母国宏观因素（杨清，2006）、产业基础（卢进勇，2012）的影响。本文首先综述跨国公司成长的驱动因素，然后构造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母国因素，探索培育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驱动因素。

二、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关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因素的研究还不多，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集中于跨国公司的成长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因素。不管是跨国公司成长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可以归结为国际化驱动与创新驱动以及影响这两个驱动的制度政策因素。

（一）国际化驱动因素

（1）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就跨国公司。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1983）《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定义，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因此 OFDI 是促使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各类跨国公司理论都明确阐述了 OFDI 的地位，如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76）、内部化理论（Buckley and Casson，1976；Rugman，198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5），可以认为 OFDI 是跨国公司形成的前提。

（2）出口发展与出口竞争力提升是 OFDI 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层面、产业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国际化路径是从出口到 OFDI 的升级。小岛清（Kojim，1978）边际产业理论从产业层面解释国际化从出口到 OFDI 的升级。费农（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角度看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只有具备较强出口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从事 OFDI。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效率水平决定了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升级，即低效率企业做内贸，较高效率企业做出口，而只有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开展 OFDI（Helpman et al，2004；Yeaple，2005；李春顶，2009）。国内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出口对 OFDI 的作用（邱立成等，2008）。因此，出口竞争力为 OFDI 提供了基础。

（3）外汇储备资源。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出口创汇的结果，另一方面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开展 OFDI 提供了条件。张翠霞（2009）、Cheung 和 Qian（2009）研究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如果外汇资源大量闲置，说明企业对外投资动力不足，不利于本地跨国公司的成长。

（二）创新驱动因素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依赖于其独特的技术优势（Hymer，1960；Dunning，1975），大型跨国公司更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姚利民，2003）。反过来，贸易与投资的国际化促进创新知识的跨国外溢（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产业技术的逆向外溢，从而促进本国产业创新（Kogut and Chang，1991；赵伟等，2006；王英和刘思峰，2008；欧阳艳艳，2010；姚利民和王若君，

2011)。Alberto 等(2012)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研发投资的案例,发现中国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目的在于学习而不是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创新与跨国公司成长具有互动性,而世界水平跨国公司更依赖产业技术创新。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但是只有依赖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才能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

大量文献研究跨国公司成长中的创新因素,创新驱动是世界 500 强企业成长的基础。汪劲松(2002)研究世界 500 强企业的成功经验得出:技术创新与管理整合能力是重要因素。邱林峰(2008)研究了世界 500 强长寿企业的成功因素,创新与变革是诸多因素中十分重要的因素。王晓东(2011)研究日本 500 强企业,认为核心技术与国际竞争力对日本 500 强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毛蕴诗等(2006)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 500 强企业水平重新超越日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具有新企业培育的硅谷机制与老企业重新崛起的公司重构。

(三) 政府支持与制度因素

Wang 等(2012)研究了中国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认为政府支持和母国制度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技术和广告不太重要。张为付(2008)认为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具有显著正影响。经济理论一般认为市场自由竞争更有利于企业成长,也更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与创新成长,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倾向于政府的少干预。但是,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跨国公司成长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将抑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因此,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跨国公司成长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四)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分析

虽然关于跨国公司成长因素的研究文献很多,但研究重点是微观层面的跨国公司成长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关于国家层面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从宏观经济基础、中观产业基础、微观企业能力等 3 个层面归纳国际化与创新作为跨国公司成长的动力源泉。

一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受到该国宏观经济基础、中观产业基础与微观企业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化与创新成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持续成长的双轮驱动源泉,其关系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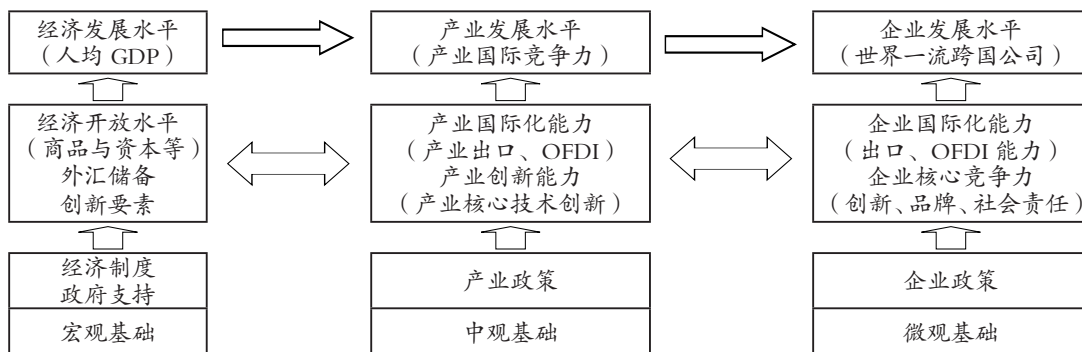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双轮驱动模型关系图

(1) 宏观经济基础: 根据 Dunning(1988) 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才有更多的资源与能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进而促进其跨国公司的成长。Lall(1983) 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和 Cantwell 等 (1990)、Tolentino(1993) 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指出了技术创新优势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内外大量文献关注宏观因素对跨国公司成长的影响。张为付 (2008)、张翠霞 (2009)、温磊 (2013) 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出口贸易、汇率、人均 GDP 等指标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Cheung 和 Qian(2009) 研究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张为付 (2008)、Wang(2012) 等发现政府支持和母国的制度结构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 从出口到 OFDI 的开放水平升级以及创新资源积累与利用是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基础。

(2) 中观产业基础: 根据 Cantwell 等 (1990) 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可以提高企业技术能力, 同时随着技术积累、地域扩展以及对外直接投资, 其技术与产业优势逐渐显现并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进而有利于其跨国公司的成长。赤松要 (1932) 的产业国际转移雁型模式及小岛清 (1978) 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产业比较优势的转变是跨国公司进行 OFDI 的决定因素, 边际产业的 OFDI 促进产业国际转移, 可以充分有效地发挥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杨清 (2006) 和卢进勇 (2012) 从母国产业基础的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培育的产业基础。

(3) 微观企业基础: Hymer (1960) 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主要来自其技术、管理、品牌等垄断性优势。Dunning(1975) 认为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而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恰恰是企业核心能力的体现。Wells(1977) 认为,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处于劣势, 但是其拥有的自身市场特征、经营战略等竞争优势也推动了 OFDI 活动与公司国际化成长。国际化阶段论发现了企业从出口到 OFDI 的发展路径 (Jonanson, 1977; Claver, 2007)。新新贸易理论认为, 企业效率决定了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模式升级 (Helpman et al, 2004; Nocke et al, 2006), 而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产品边际成本, 进而直接促进海外生产 (Hirschey, 1981; Petit et al, 1998)。汪劲松 (2002)、毛蕴诗等 (2006)、邱林峰等 (2008) 认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国际化与核心竞争能力推动了其成长。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所拥有的丰裕创新资源与较高开放水平, 有一批产业具有从出口到 OFDI 的国际化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由于国际化与创新之间的互动性, 国际化与创新的双轮驱动是一国跨国公司持续成长的重要基础。在宏观层面, 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发展依赖于开放经济水平与创新能力, 决定于外汇资源与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 决定于要素配置的市场主导与政府适度干预。在中观层面, 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化能力奠定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与

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提升的基础。在微观层面,成长于集群产业体系中的领先企业,凭借其领先的国际化能力与创新能力优先成长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不管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国际化与创新的双轮驱动是跨国公司成长的源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成长将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挤压,政府的积极支持将有利于后发优势的启动。

三、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母国因素的检验方法

(一) 变量选取

因变量选取:关于跨国公司成长的研究文献都是从企业层面分析,从宏观层面的分析需要构造一个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指标。本文根据一国所拥有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及其排名计算该国一流跨国公司水平指标,即以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第一名为 500 分,第二名为 499 分,依次类推。将一国 500 强企业的得分加总来衡量该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水平(SCORE)。

自变量的选取取决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动力与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驱动(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外汇储备)、技术创新驱动(R&D 强度、国际专利等)、制度质量与政府干预(经济自由度、市场化、政府干预能力)等 4 个方面。具体指标选取与预期符号见表 1。另外需要说明:

(1) 国际化驱动指标:包括产业出口能力、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和外汇储备等 3 个方面。其中,外汇储备(RE)为该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该国跨国公司成长提供了外汇资源。但是外汇储备结余过多又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不足,可能暂时影响跨国公司的成长,因此,外汇储备指标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指标的关系符号不能确定。

(2) 制度质量和政府干预能力。通常用经济自由度指数(IEF)^①来衡量一国的制度质量,但是由于经济自由度与政府干预程度成负向关系,而政府干预往往成为后起国家鼓励跨国公司成长的重要手段,因此经济自由度指标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指数之间的关系符号不能确定。

(二) 数据来源

世界 500 强企业是被公认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代表。从入围财富 500 强排行榜的企业数量上看,历年来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等 7 个国家,本文主要选取这 7 个国家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另外,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了 1996 ~ 2011 年影响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主要指标,具体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 1。

^① 经济自由度指数(IEF)是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护和腐败等 9 个方面的综合得分(0 ~ 100 分)。

表 1 变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预期效果
因变量	一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指数 (SCORE)	一国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总得分 (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第一名为 500 分, 第二名为 499 分, 依次类推并加总)	根据财富中文网数据整理	
自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C)	人均 GDP (单位: 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正
	出口竞争力水平 (MS)	国际市场占有率	根据 WTO 数据库整理	正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水平 (OFDI)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 百万美元)	根据 UNCTAD 数据库整理	正
	技术创新水平 (RD)	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	世界银行相关数据	正
	制度质量或政府干预水平 (IEF)	经济自由度指数	美国传统基金会	正或负
	外汇资源 (RE)	外汇储备 (单位: 百万美元)	联合国数据库	正或负

(三) 模型选择

首先,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其次, 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和因果检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 说明自变量之间只有低度相关或不存在相关关系, 自变量都可以进入回归模型。再次, 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针对外汇储备 (RE) 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 (SCORE) 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短期内外汇储备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单向因果关系。

1.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影响因素的模型选择与结果 首先, 选择一国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总得分作为因变量, 以人均 GDP、对外直接投资额、国际商品市场份额、研发强度、经济自由度指数、外汇储备等 6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 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其次, 通过单位根检验, 得出一阶差分稳定, 因此变量取差分, 得到模型:

$$\Delta \ln Score_{i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GDPC_{it} + \beta_2 \Delta \ln MS_{it} + \beta_3 \Delta \ln OFDI_{it} + \beta_4 \Delta \ln RD_{it} + \beta_5 \Delta \ln IEF_{it} + \beta_6 \Delta \ln RE_{it} + \mu_{it} \quad (1)$$

最后, 使用 EViews6.0, 对面板数据进行 Hausman 检验和 F 检验, 最终确定了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横截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问题的, 对混合回归模型进行截面似不相关加权, 并采用 Cross-section SUR (PCSE) 估计方法回归, 得到表 2 中的模型 1 结果。

2.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提升影响因素的模型选择与结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 将模型 (1) 的因变量 (一国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总得分) 更换为各国世界 500 强企业水平总得分的变化 (3 年成长或 5 年成长), 考虑到该数值含有非正数据, 故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且考虑到其水平

提高的幅度可能具有滞后性，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到模型：

$$\Delta \ln Cscore_{it-m}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GDPC_{it-m} + \beta_2 \Delta \ln MS_{it-m} + \beta_3 \Delta \ln OFDI_{it-m} + \beta_4 \Delta \ln RD_{it-m} + \beta_5 \Delta \ln IEF_{it-m} + \beta_6 \Delta \ln RE_{it-m} + \mu_{it}$$

(2)

面板回归分析各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 3 年和 5 年成长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估计，得到表 2 中的模型 2、模型 3 和模型 4 结果。

表 2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影响因素检验结果汇总表

成长水平影响因素 因变量： $\Delta \ln Cscore_{it}$		3 年成长水平影响因素 因变量： $\ln Cscore_{it}$			5 年成长水平影响因素 因变量： $\ln Cscore_{it}$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系数	变量	系数
$\Delta \ln GDPC$	0.291142***	$\Delta \ln GDPC(-3)$	-0.311943***	-0.319208***	$\Delta \ln GDPC(-5)$	-1.34457***
$\Delta \ln MS$	0.223055*	$\Delta \ln MS(-3)$	0.36195***	0.500866***	$\Delta \ln MS(-5)$	0.982856**
$\Delta \ln OFDI$	0.020368**	$\Delta \ln OFDI(-3)$	0.019022**	0.021639**	$\Delta \ln OFDI(-5)$	-0.118872***
$\Delta \ln RD$	1.175257***	$\Delta \ln RD$		-0.651678***	$\Delta \ln RD(-5)$	0.306494
$\Delta \ln IEF$	-0.405071*	$\Delta \ln RD(-3)$	-0.134368	0.259657**		
$\Delta \ln RE$	-0.092304***	$\Delta \ln IEF(-3)$	-0.884356***	-1.265898***	$\Delta \ln IEF(-5)$	-4.989551***
		$\Delta \ln RE$		-0.093761***	$\Delta \ln RE(-5)$	0.054261
		$\Delta \ln RE(-3)$	0.034569	0.084677**		
统计量 R^2	$R^2=0.435136$		$R^2=0.417201$	$R^2=0.641986$		$R^2=0.625332$
统计量 F 和 P	F=12.58216 P=0.000000		F=7.516491 P=0.000000	F=13.67307 P=0.000000		F=17.52478, P=0.000000

注：△表示一阶差分，(-3)、(-5)表示滞后三期和五期，***、**、*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水平。

四、检验结果的分析

（一）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母国因素

通过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 GDP、国际市场占有率、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研发强度等变量均与各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变量呈正相关，和预期结果一致；经济自由度变量和外汇储备变量与各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变量呈负相关，和预期结果不一致。

（1）人均 GDP（GDPC）的回归系数为 0.291142，与预期假设相符，表明一国人均 GDP 的增加可以使一国在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的排名总得分增加，即能使该国世界 500 强企业成长水平有所提高。

（2）国际市场占有率因素（MS）的回归系数为 0.223055，表明一国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促进了该国世界 500 强企业的成长。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体现该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拥有一批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产业，该国才能成长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说明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需要强大的产

业基础作支撑。

(3)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的回归系数为 0.020368, 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有利于该国世界 500 强企业成长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发展是一国大量企业进入国际化水平更高阶段的体现, 只有大量企业的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实践, 才能培育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能力。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可以看作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培育的国际化实践基础, 体现一国强大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

(4) 技术创新因素 (R&D) 的回归系数为 1.175257, 表明增强研发强度也可以提高一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水平, 即技术创新能促进该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21 世纪以来, 科技创新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各国之间和各国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依赖国家强大的创新资源积累与投入, 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基础,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成长就没有持久的成长动力。

(5) 经济自由度因素 (IEF) 的回归系数为 -0.405071, 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与理论预期不符。经济自由度的提高一方面体现了企业自由发展与市场竞争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跨国公司成长支持力度的不足。因此, 经济自由度指数指标恰恰是政府干预的反方向指标。经济自由度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国家对跨国公司成长的支持越多, 越有利于本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6) 外汇储备因素 (RE) 的回归系数为 -0.092304, 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一国的外汇储备增加降低了一国在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的排名总得分, 即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成长。原因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反映了国家外汇资源的利用不足, 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不足, 对外投资不足当然不利于本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二)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 3 年成长和 5 年成长的母国因素

通过模型 2、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可知, 仅检验滞后 3 期或滞后 5 期的自变量数据对因变量的影响时, 结果都表明研发强度和外汇储备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影响显著的自变量中, 两种情况的人均 GDP、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经济自由度变量对因变量的正负影响均是一致的, 分别呈负相关、正相关和负相关。

(1) 较低收入水平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成长潜力更大。一国 3 年前或 5 年前的人均 GDP 与其对应的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负相关, 说明一国前期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降低其后期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升幅度, 高收入国家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提升速度将会减缓, 这是受到后起新兴国家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追赶与竞争的影响。相反, 较低收入水平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成长反而有更快的提升速度。即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发展具有多国化倾向, 后起的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发展更有潜力。

(2) 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较长期的积极影响。一国 3 年前或 5 年前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与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 而且系数不断提高, 说明一国前期

国际竞争力对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产业基础。

(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具有阶段性。5 年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其对应的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负相关, 而 3 年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相对应的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 说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4) 技术研发具有长期性, 而外汇储备变量具有短期效应。一国 3 年前的研发强度与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 而当年的研发强度却与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负相关, 说明一国的技术研发对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一国 3 年前外汇储备与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 而当年的外汇储备却与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 3 年前一国的外汇储备相对较少, 对应着该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而加快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 而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 恰恰反映出当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不足, 因而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成长。由此得出, 研发投入对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升具有长期效应, 而外汇储备变量只有短期效应。

(5) 政府干预的积极影响。一国 3 年前或 5 年前的经济自由度对其跨国公司成长水平的提高具有负面影响。经济自由度指标可以看作是政府干预程度的反向指标, 说明国家对跨国公司支持力度的降低, 在较长时期内会降低跨国公司的成长速度。由此得出,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已有跨国公司理论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次的国际化与创新双轮驱动分析框架。微观层次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依赖于较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发展与发达的中观产业水平。实证分析显示,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企业国际化与创新提供了宏观基础, 产业层面的国际化与创新对本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提供了中观基础, 政府的适度干预和外汇储备的积极利用对驱动本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 人均收入水平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经济基础。中国达到较高收入水平之后, 国家外汇储备充裕,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提高, 政府的积极鼓励措施将有效推进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当中国达到高收入水平后, 中国跨国公司 will 进入成长水平减缓期。

其次, 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需要坚实的产业创新与出口竞争力支持, 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将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产业基础。技术创新对跨国公司成长具有长期效应, 而短期内不一定有效, 因此要不遗余力地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强有力的出口竞争力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产业基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 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出口转型升级, 形成创新驱动

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中国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培育才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最后,外汇资源的闲置与政府过早地实施不鼓励政策,将不利于中国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成长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挤压,特别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才能启动后发优势。中国要利用雄厚的外汇资源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对于有国际化经验与实力的民营企业,要鼓励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兼并收购,提高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中国跨国公司的创新与国际化成长需要政府政策的积极鼓励与培育。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魏星,高宇宁.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评价(2003~2011):世界500强的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 [2] 卢进勇.“走出去”战略与中国跨国公司崛起: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 [3] 毛蕴诗,戴黎燕.从美日企业世界500强的变动看其竞争力消长[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5).
- [4] 邱立成,王凤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6).
- [5] 杨清.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6.
- [6] 姚利民.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性投资与技术进步[J].国际商务研究,2003,(5).
- [7] 赵斌.中央企业如何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若干思考[J].跨国经营,2012,(07).
- [8] 张翠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1).
- [9]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
- [10] Alberto, Di Minin, et al.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D in Europe: A New Model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30).
- [11] Wang, C., et al.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21,(3).
- [12] Cheung, Y., Qian, X.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9, 14,(3).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me Country's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YAO Li-min WANG Ai-li

Abstract: We need a large amount of world first clas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but these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growth will be influenced by factor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perspectives, like macro, median and micro, which are the growth foundation for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seven countries from 1996 to 2011, the paper constructs a national index of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home country's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Fortune 500. It reveals that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growth requires a large amount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FDI, comparatively high income as economic base, high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 as industrial base, high R&D intensity as innovation base, as well government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The growth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eeds positive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top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ome factor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novatio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责任编辑:梁丽华)